

国家史的叙事丢弃。^① 虽然民族国家已不再是史家分析历史的最常见单位，但仍是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取向可以给那些民族国家史研究者提供有效的修正方向，而不再视民族国家为一种特定历史。究竟全球史会将史学带往何处？史家亨特的最近看法可供参考：“全球史或全球转向不应该只是给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宽广和更宏大的历史研究视野，还必须提供一种更恰切的研究视野。”这一看法或许是全球史研究未来要面对的重要问题。^②

超越全球史与世界史编纂的其他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旭鹏

作为世界史编纂方式之一的全球史，因其对人类过往所持的全球视角，以及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彼此联系与交相互动的重视，极大丰富和深化了当今的世界史研究，使之更能满足全球化时代人们对一种新的全球叙事的需要。^③然而，在人类历史进程日趋一体化的背后，却是各种地方主义诉求的此起彼伏，民族国家边界的打破虽然带来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但也造成持续不断的族裔摩擦和种族纷争。即使在同一文明内部，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各个社会之间的价值冲突，似乎比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还要剧烈。^④全球化在带来文化、制度乃至景观趋同的同时，却无法否认日益纷繁的多样化和基于差异的认同政治。

生活在“全球叙事黄金时代”的乐观主义，让历史学家看到全球史的可能性和必然性。^⑤但是，迄今为止，全球史在表现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上做得并不成功，甚至有一种以单一叙事来取代多元叙事的危险。而漠视人类历史的多样性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只能让这种全球叙事成为带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的主导叙事，不但拒斥其他来自地方经验的叙事，而且无助于认识和理解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近年来，对全球史的反思和批判已经引起学者

① Rosemarie Zagari,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Global Turn’ for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 32, no. 1 (Spring 2011), p. 7.

② Lynn Hu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lobal Context,” in David Armitage and Sanjay Subrahmanyam, eds., *The Age of Revolutions in Global Context, c. 1760–184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34.

③ 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当前的世界史和全球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对象上，都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在某些历史学家，比如布鲁斯·马兹利什看来，全球史似乎更强调全球化的历史，或对历史上全球化因素的追溯。关于全球史与世界史的不同之处，参见 Bruce Mazlish,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8, no. 3 (Winter 1998), pp. 389–390. 马兹利什在 2006 年甚至提出“新全球史”的概念，指出新全球史的研究重点是二战以来的全球化的历史，参见 Bruce Mazlish, *The New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12.

④ Dieter Senghaas, *The Clash within Civilisations: Coming to Terms with Cultural Conflic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6.

⑤ Kerwin Lee Klein, “In Search of Narrative Maste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4 (Dec. 1995), p. 298.

的足够关注,^①不过那种为之贴上西方意识形态或新殖民主义标签的做法却显得过于草率和情绪化。只有深入其内在机理并追溯其发生、发展的学术渊源,并将之置于当前世界史编纂的其他脉络之中,通过比较来审视它的局限,我们才能较为客观地揭示全球史的种种不足,进而予以补充和完善。

一、全球史及其不满

任何一种试图对人类、地球或者宇宙进行总体描述的历史,比如世界史、全球史以及最近流行的大历史(big history),都可以归结为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而普遍史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历史哲学,其目的并不在于对过去进行详致的再现与描述,而是对未来提供一种“预言”或“预测”。^②柯林伍德在论及18、19世纪的普遍史体系时,曾这样评价:“关于这些体系,真实情况乃是它们是些预言,并且大体上是相当准确的预言,预言的是到往后几代人从事历史研究所要遵循的路线。”^③早期的普遍史,特别是罗马和基督教时代的普遍史,通常蕴含着两大主题,即罗马人的征服和基督教的胜利。对过去的所有解释都可以看作是对实现上述两个主题的回溯式预言,过去因而成为未来的铺垫和准备。^④在普遍史的最新形式大历史中,预言的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大卫·克里斯蒂安指出:“大历史必然要关注大趋势……以一种大视野去审视过去必然会提出有关未来的问题,而对于不远的未来和遥远的未来来说,至少有一些答案是现成的。”另一位大历史学者弗莱德·斯皮尔也强调,大历史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在不远的未来所面对的重大挑战”。^⑤

与早期普遍史对未来所作的政治隐喻和神学隐喻以及大历史基于现代创世神话的完整性而展望人类未来一样,全球史的预言性也表现在它强烈的目的论色彩和对历史必然性的追求中。大多数全球史论著在对人类历史的整体叙述中,都暗含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判断,即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类最终会走向统一,且自始至终都在顺应着这一趋势。为使这种价值判断成为可能,全球史史学家需要赋予人类历史的空间或横向整合以一种时间或纵向上的连贯性,全球化或全球历史的形成因此被推向遥远的过去。^⑥与之相应,全球史编纂的源头也常常被追溯到希罗多德

① 比如,多米尼克·塞森麦尔指出:“全球史的真正潜能在于运用多种视角的文化上的普遍取向。任何具有明显全球视角的研究还必须找到平衡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方法。它必须对全球结构的内在差异和地方力量的全球维度保持同样的敏感度。”参见Dominic Sachsenmaier,“Global History and Critiques of Western Perspectives,”*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42, no. 3 (Aug. 2006), p. 455.中国学者对于全球史的批评与质疑,可参见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80—187页。

② Ewa Domanska,“Univers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no. 35, 1999, p. 130.

③ 柯林伍德:《历史哲学纲要》,《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0页。

④ 比如波利比阿的《历史》和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波利比阿的《历史》被认为是第一部普遍史,攸西比乌斯的《教会史》则被看作第一部基督教化的普遍史。

⑤ David Christian, *Maps of Time: 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7; Fred Spier, *Big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0, p. IX.

⑥ 1492年或1500年通常被认为是全球化的起点,但也有学者提出全球化其实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就已开始。参见William Green,“Periodizing World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 vol. 34, no. 2, Theme Issue 34 (May 1995), pp. 99-111; Justin Jennings, *Globalizations and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一些经济史学者对全球史史学家将全球化的起源大幅度提前表示质疑,他们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全球化始于5000年之前或500年之前,它只发端于19世纪早期,完

或司马迁那里，以此说明全球意识也并非现代的产物，它在那些具有广阔视野的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业已成型。^①尽管这种服务于未来的倒溯策略，能够让全球史学家成功地连缀起一个完整的和没有中断的全球史谱系，却也使得全球史的叙事成为一个问题。

海登·怀特在论及谱系学式的历史叙事时指出：“历史的叙事化过程将每一种现在一方面转化成一种‘过去的将来’，另一方面转化成一种‘将来的过去’。由于现在被视为过去和将来之间的一种过渡，因而，它既是过去人类行动者所实施方案的一种实现，同时又是对将来活着的人类行动者即将实现的可能性方案领域的一种确定。”^②立足于现在而讲述全球叙事的全球史学家，其任务也就是将人类过去的全球性与人类的全球性未来联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此，全球史学家有意选择那些代表人类历史整体性和一致性的事件，对过去进行重组和编排，而大量体现着多样性和差异的历史现象却被忽略了。或者，尽管有时全球史学家也承认人类历史的破碎性，但却认为这种破碎性最终会归于统一。在这样的全球史叙事中，全球史学家呈现出的只能是一种一体化，那些潜藏在一体化之下的起着离心作用的反体制力量都被排除在全球史的叙述之外。

在构建全球叙事时，全球史学家诉之于一种全球视野，而全球视野正是全球史得以告别以种族主义为中心的旧有的世界史的标志。不过，无论这种全球视野有多大，它必须借助一种单一的主导叙事才能将它目力所及的所有地区整合在一起。而单一的主导叙事又往往总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因为它需要从自我的文化和经验中汲取重构过去的知识与灵感。因此，当前的全球史在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宰制后，有可能会走向另外一个中心主义。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指出的：“承认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历史现象，就必须将之放在其他的统治事例中加以考察，在这些统治事例中，欧洲中心主义既不是第一个，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③对全球史来说，这真是一个悖论。

如果说注重整体性的全球史叙事必然会忽视地方因素且可能滋生出一种种族中心主义倾向，那么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这一全球史的核心概念似乎是对上述缺陷的弥补。在全球史学家的理解中，跨文化互动不仅对所有卷入其中的人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以此为全球史分期的标准，会摆脱种族中心主义偏见。^④从字面上看，“互动”意味着不同主体之间双向的交流，但纵观人类历史，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并不总是双向的，它有时更多地表现为单向的、不对称的甚至强制性的。杰里·本特利列出了世界历史上跨文化互动的三种进程：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战争和远程贸易。^⑤除远程贸易具备双向交流的特点外，大规模移民和帝国扩张战争显然是单向的，并具有明显的强

① 全是一个现代现象。参见 Kevin H. O'Rourke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When Did Globalisation Begi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6, no. 1 (Apr. 2002), pp. 23-50.

② 对全球史编纂传统的回顾，可参见 Jerry H. Bentley, *Shapes of World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Scholarship*,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6; Patrick O'Brien, "Historiographical Traditions and Modern Imperatives for the Restoration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 no. 1 (Mar. 2006), pp. 3-39.

③ 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④ Arif Dirlik, "Is There History after Eurocentrism?: Globalism,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Disavowal of History," *Cultural Critique*, no. 42 (Spring 1999), p. 12.

⑤ Jerry H. Bentley,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1, no. 3 (Jun. 1996), p. 750.

⑥ Jerry H. Bentley,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p. 752.

制性,其本质是强势文明和一体化力量在全球的扩散,而不是各种地方传统和经验的相互塑造。此外,“互动”还暗示了对等和自愿的原则。但在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1500年以后,互动主要表现为西方对非西方的霸权与压制以及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力行为,非西方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甚至反抗的境地。因此,在理解全球史中的互动问题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必须被考虑在内,必须看到其中所包含的冲突与斗争、统治与反抗。近年来在研究不同地区的交往问题时,历史学家更愿意使用“遭遇”(encounter)一词,因为它比“互动”更能体现全球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①

关于“互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它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全球史学家对此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分析和明确的回答。在他们看来,互动显然来自人类交往的需要,这种需要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是自觉的。或者,将之归结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一论断与19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进步”观念十分类似,它们都秉承人类历史不断朝着更高和更完善等级发展的理念,其背后透露出的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比如,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认为,“普遍的世界历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universal world history)观念指的是“世界的进程可以用某种合理性的目的来加以衡量”。^②黑格尔在《世界历史哲学讲演录》中也指出,“世界历史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世界历史展现了精神的自由意识的发展”。^③这种理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念在当代,尤其是美国史学界有三个变体:一是体现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及其追随者;三是当前的全球史研究。^④其中,全球史因其较为公允的价值立场而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主流。然而,不论采用何种分析方法,理性主义的世界历史观都具有鲜明的排他性,都倾向于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原为某一终极目的。对于全球史学家来说,互动就是人类历史演进的终极目的。但在实际上,互动并不是展现全球历史的唯一途径。娜塔莉·戴维斯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向我们展示了两个彼此分离、毫无关联的地方故事在展现相同的全球历史面貌时的可能性,并对“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史’就是描述过去的唯一适合的方式”这一论断提出质疑。^⑤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 J. J. Clarke,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John Rennie Short, *Cartographic Encounter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World*,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9; Susan Castillo, *Colonial Encounters in New World Writing, 1500-178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Brian Sandberg, “Beyond Encounters: Religion, Ethnicity, and Violence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 1492-1700,”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7, no. 1 (Mar. 2006), pp. 1-25; Karina Attar, “Muslim-Christian Encounters in Masuccio Salernitano’s Novellino,” *Medieval Encounters*, vol. 11, no. 1-2 (Apr. 2005), pp. 71-100.

② Immanuel Kant,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Aim,” in Amélie Oksenberg Rorty and James Schmidt, eds., *Kant’s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Aim: 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1.

③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79, 118.

④ 参见 Trevor R. Getz, “Towards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World History,” *History Compass*, vol. 10, no. 6, 2012, pp. 483-495.

⑤ Natalie Zemon Davis, “Decentering History: 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

二、后殖民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

将后殖民主义视角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以印度历史学家为主的“庶民研究”学派不断努力的结果。^①“庶民研究”作为一项研究计划虽已结束，但影响力至今犹存，由其所衍生出的“后殖民史学”早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史学形态。^②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西方历史知识体系的合理性提出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启蒙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历史主义进行批判，反对理性的和进步的历史观；第二，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性作出否认，强调历史差异和多样化的历史表现方式；第三，对西方历史话语中的权力关系提出拷问，质疑其客观性与合理性。当前，后殖民史学的实践者已经不再仅限于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识分子，许多欧美学者也纷纷将之作为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

具体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后殖民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殖民主义重新置于世界史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和考察。与以往的研究侧重殖民主义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影响不同，后殖民史学探究的是殖民地知识（colonial knowledge）如何影响和决定宗主国（西方）对殖民地（非西方）的认知和想象，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西方的权力运作。伯纳德·科恩的《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可谓这一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作者通过分析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各种知识的发现、收集、整理和分类，细致而独到地展示了英国文化霸权和政治控制在印度的逐步确立。^③近期的一些著作同样体现这一趋势。

比如，尼娜·布雷的《海市蜃楼：拿破仑的科学家与揭开埃及的面纱》剖析1798年随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法国科学家的科学考察行为。此次科学考察可以看作是现代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它带来双重的结果。对欧洲而言，大量有关埃及的天文学、数学、博物学、化学、生物学以及艺术方面的知识，不仅在欧洲促成一股经久不息的埃及文化热，也极大地影响了欧洲人的历史思维和科学意识。对埃及来说，穆罕默德·阿里的政府开始派遣医生、士兵、工程师和教育家前往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埃及现代化的序幕由此揭开。但在另一方面，此次科学考察之后，欧洲便开始对埃及进行肆无忌惮的文化掠夺，埃及则在现代性文化上更加依赖于欧洲。欧洲与埃及彼此勾连的知识生产，显然是在一种权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完成的。作者进而提出更具世界史意义的思考：欧洲与埃及的跨文化互动，究竟是加深还是减缓了延续至今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不信任？究竟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起一座联系的桥梁，还是将一种文化的统治强加于另一种文化之上？^④

布赖恩·理查森的《经度与帝国》有着相似的主题。该书叙述詹姆斯·库克船长在南太平洋上的三次航行及其对形塑世界的意义。库克在其航行中，为地球上不少尚未被西方所知的地

①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2 (May 2011), pp. 188-202. 引文见第192页。

① 关于后殖民主义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参见张旭鹏：《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第107—116页；关于庶民研究，参见张旭鹏：《“庶民研究”与后殖民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第82—92页。

② 2002年出版的《西方史学思想指南》一书就将后殖民史学列为专章介绍。参见Prasenjit Duara, “Postcolonial History,” 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 ed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pp. 417-431.

③ Bernard S.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 The British i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Nina Burleigh, *Mirage: Napoleon's Scientists and the Unveiling of Egyp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7, pp. 247-248.

带绘制了大量地图,其精确度和规模都超过以往。经他绘制的岛屿和海岸线地图,也首次出现在西方的地图集和航海图集内。库克在绘图学上的贡献完全改变了此前西方人绘制地球时的片段性和模糊性,被认为创造了真正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受库克绘图学范式的影响,西方人开始以更为精确的方式去绘制世界地图,世界各国的位置得以明确化,与各个地方相关的民族、动物、植物也得到收集、辨认、理解和命名。库克的三次航行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关于世界的知识,既塑造了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全球知识体系,也为创建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奠定了知识基础。作者最后指出,西方对非西方知识和信息的收集与整理,不仅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交织,更因其高度的精确性和科学性而改变了知识与权力的组织形式。^①

对历史上殖民帝国的考察,是后殖民史学重构世界史的另一个重要尝试,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的兴起。^②帝国作为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聚合体,以及它在政权上的普世性要求,向来是理解全球联系无法回避的主题。近年来的帝国研究,已经摆脱欧洲中心或单一民族的视角,力求探寻帝国内部的多样性与帝国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③与之有所不同的是,后殖民史学更关注殖民帝国是如何通过其庞大的机构行使权力,以及殖民地又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抵制这种权力。殖民帝国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这一权力的反抗,构成世界史中交换与互动的“另类”模式,因为它代表着创伤的体验和痛苦的回忆。用穆芮纳丽尼·辛哈的话说就是:“帝国总是一项肮脏的事业。它所推动的交换总是强制性的和不平等的。暴力从不会远离帝国。”^④所以,世界历史中的权力问题要比跨文化交流 and 大规模贸易更为复杂和深刻,无此我们难以理解过去的世界和当今的世界。

从帝国的视角研究世界史还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纠缠”(entangled)的世界图景或世界网络。与那种单向或双向的联系不同,帝国的网络异常繁杂,不仅包含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垂直联系,还有帝国内部各个殖民地之间的多向联系,以及相互竞争的帝国之间的平行联系。^⑤在这一网络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合作、协商、妥协和抵抗。帝国网络中的每一个主体,不论是宗主国还是殖民地,都处在相互构造和彼此依赖的瓜葛之中。宗主国固然对殖民地产生重要影响,但殖民地对宗主国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一些学者注意到“殖民主义的回流”给宗主国造成的各种变化。比如,大量殖民地居民向宗主国的回流,在改变宗主国人口构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包括饮食、服装、语言和艺术形式在内的文化混杂状态,不仅重塑了宗主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⑥与那种单一的全球叙事相比,这种多层次的纠结的历史更利于揭示现代世界的复杂性。

① Brian W. Richardson, *Longitude and Empire: How Captain Cook's Voyages Changed the World*, Vancouver, 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6.

② Stephen Howe, "Introduction: New Imperial Histories," in Stephen Howe, ed., *The New Imperial Histor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2.

③ 相关的代表性著作,可参见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in 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该书曾获 2011 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

④ Mrinalini Sinha, "Projecting Power: Empires, Colonies, and World History," in Douglas Northrop,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 Malden and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2, p. 270.

⑤ 对帝国网络的深刻分析,可参见 Alan Lester, *Imperial Networks: Creating Ident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South Africa and Britai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⑥ Michael H. Fisher, *Counterflows to Colonialism: Indian Travellers and Settlers in Britain, 1600-1857*, New Delhi: Permanent Black, 2004.

三、跨民族史与区域史

与全球史的全球视野不同,跨民族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将研究的基本单位重新放在民族或民族国家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史(national history)的回归,而是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作用。从空间上来看,跨民族史的对象既可以是相邻的两个或多个民族,也可以是不相邻的两个或多个民族。民族之间的界线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边界,也包括抽象的文化边界。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将跨民族史理解为一种在兼顾民族国家历史的背景下,对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互动与联系进行研究的世界史新范式。丹尼尔·罗杰斯的《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堪称此类范式的典型之作。该书描述大西洋两岸的西欧和北美在社会政策方面的相互联系、交流与竞争,反映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如何努力弥补过度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该书的视野不仅跨越了大西洋,而且远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始终把握着民族国家间交流互动的脉络。^①

新近出版的《帕尔格雷夫跨民族史辞典》,对跨民族史研究的主旨进行了更为详致的概括。编者指出,现代世界史不仅要被理解为民族史的总和或国家间事务的编年史,而且要被理解为并不总是局限在世界上任何特定国家或地区,也不仅限于某些国家和政府的人员、商品、观念和技能的联系和流动的历史。只有理解各种跨越边界的流动、联系和挪用,我们才能完全把握历史的本质。在这种跨民族联系和互动而不是国家或国际事务的框架内,即便是税收、冷战等众所周知的事项,也会呈现出全新的意义。^②

从研究内容来看,跨民族史与全球史有着诸多相似和重叠之处,但跨民族史的研究尺度并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局部的或者聚焦于某个地理范围之内。这种研究视角更有利于研究者去突出地方经验,从而将微观研究与宏大叙事结合起来。入江昭在对跨民族史和全球史作出区分时指出:“正如全球史在概念上将自身与世界史区分开来一样,跨民族史或许同样可以与全球史区分开来,因为它涉及的可能并不必然是全球性的,但依然是跨越民族的力量和主题,比如地区共同体,地区间的移民、疾病和环境问题。像人权和恐怖主义这样的主题当然可以放在全球史的概念框架中加以理解,但跨民族史会赋予这些主题特定的时间段,因为跨民族的联系和现象可以说是与17世纪以来的民族史共同发展而来的。”^③

对于入江昭将跨民族史的上限定在民族或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他们建议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nation”一词,将之视作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④这样,跨民族史的研究方法便可以应用到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娜塔莉·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也可以被视作一部跨民族史著作。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被称作“非洲人列奥”(Leo Africanus)的摩洛哥穆斯林外交官,他被海盗掳往欧洲后,接受教皇列奥十世的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列奥在意大利生活期间,根据其在非洲的游历写下《非洲印象》(Description of Africa)一书,并因此在欧洲获得受人尊敬的学者的地位。

① Daniel T. Rodgers,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Cambridge and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② Akira Iriye and Pierre-Yves Saunier, eds.,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③ Akira Iriye, "The Transnational Tur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1, no. 3 (Jun. 2007), p. 375.

④ Bartolomé Yun Casalilla, "'Localism,' Global History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 A Reflection from the Historian of Early Modern Europe," *Historisk Tidskrift*, no. 4, 2007, p. 667.

九年后,列奥重返非洲,成为“哈桑·瓦赞”(Al-Hasan Al-Wazzan)。戴维斯通过这一个案研究,生动地描述了列奥在两个文化世界之间跨越但又纠结于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故事。^①

一个与跨民族史的研究旨趣比较接近,但略有不同的世界史编纂方式是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阿兰·梅吉尔指出,存在两种区域史。一种是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某个区域的历史;一种是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区域的历史。前者介于民族史与地方史(local history)之间,后者介于民族史与全球史或世界史之间。^②保罗·克莱默则认为,不论是第一种区域史还是第二种区域史,都可以通过某些政治经济或地缘政治途径与世界史或全球史发生联系。^③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史的研究早已有之,比如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不过,布罗代尔是从总体史的角度来理解地中海的,而当前的区域史突出的却是地中海世界的多样性而非统一性。^④

当下西方区域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是大西洋史(Atlantic history)。美国历史学会自1998年起开始设立大西洋史学奖(The James A. Rawley Prize in Atlantic History),从其中一些获奖图书的研究主题中不难看出,大西洋史研究的重点是现代早期美洲、欧洲和非洲或者英国、法国及其在美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所构成的经济和文化区域之间的联系。^⑤对于大西洋史在世界史编纂中的意义,迈克尔·吉梅内斯和马尔库斯·雷迪克在《什么是大西洋史?》中作出这样的评价:“大西洋史在探索全球史或世界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随着这一区域的研究和写作的展开,它将必然涉及与其他地理或文化区域(太平洋圈、伊斯兰世界、欧亚大陆、西方‘文明’等)的比较,这些互动也会影响到大西洋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以及大西洋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历史。”^⑥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区域史就是构成世界史或全球史之一部分的区域性经验。如果将各个区域具体而特殊的历史经验抽离,世界史或全球史就将成为空洞而缺乏具体内容的抽象概念。反之,世界史或全球史若要避免一元化趋势,也必须借助区域性经验,使自身朝着跨区域史的路径发展。诚如梅吉尔所言:“世界历史如果是按照彼此差异但却相互关联的国家及区域历史并行撰写的方式、而非单一叙述的方式,将得到更好的呈现。”^⑦

无论是后殖民视角下的世界史研究,还是作为潜在的世界史编纂模式的跨民族史或区域史

① Natalie Zemon Davis,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② 阿兰·梅吉尔:《区域历史与历史撰写的未来》,肖超译,《学术研究》2009年第8期,第89—100页。

③ Paul A. Kramer, “Region in Global History,” in Douglas Northrop, 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2, pp. 203-204.

④ David Abulafia, “Mediterranean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2 (May 2011), p. 221.

⑤ 如 Karen Ordahl Kupperman, *Indians and English: Facing Off in Early Americ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Londa Schiebinger, *Plants and Empire: Colonial Bioprospecting in the Atlantic Worl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abine MacCormack, *On the Wings of Time: Rome, the Incas, Spain, and Per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David Eltis and David Richardson, *Atlas of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⑥ Michael Jiménez and Marcus Rediker, “What Is Atlantic History?” http://www.marcusrediker.com/Articles/what_is_atlantic_history.htm.

⑦ 阿兰·梅吉尔:《区域历史与历史撰写的未来》,《学术研究》2009年第8期,第99页。

的进展,在本质上都是对全球史偏重整体性和一致性,而忽视地方差异和多样化的一种纠正。如同任何一种历史叙事一样,全球史叙事也建立在对不同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记录之上。因此,在研究跨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全球史史学家必须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将全球性进程与各种地方文化差异联系起来。那种强调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全球史不能成为唯一的和权威的叙述。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能够成功地撰写一部较为客观的全球史的话,这种全球史也应当是一种全球时代承认差异的历史。当前历史学家的任务,借用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这一概念,^①就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一种“承认的历史”(the history of recognition)。

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②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永平

全球史(global history)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之一。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史传入中国以后,在中国史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史,并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借鉴全球史的理念与方法来研究历史,在传统研究范式中取得创新。然而,方兴未艾的全球史在中国主要还是受到世界史和史学理论研究者的青睐和欢迎。与他们热烈谈论和倾心引介全球史的热情相比,全球史在中国史研究者中却显得相对冷清,鲜有回应。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有关系吗?在我们的中国史研究中需要全球史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的分立

在中国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中,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分立是一个既成事实:世界史首先是除中国史之外的地区与国别史,其次才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而中国史则主要是以历代王朝兴衰和社会变迁为线索的断代史和各种专题史的分解与整合。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者也都很注重这种学科的划分和自己身份的认同,除了极个别学贯中西的权威和大家,大多数学者都会划地为牢,自觉站队,给自己贴上“我是研究中国史的”和“我是研究世界史的”标签,形成两个研究内容完全不同的“学术圈”。如果不这样,就好像是一个没有“组织”和不被圈内人认同的“学术盲流”一样。这种状况的形成既有历史学科本身发展的原因,也是现实需要的考量。

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分立,产生很多弊端,如以研究中国古代史见长的何兹全早就指出“在我们的历史知识中,中国史和外国史挂不上钩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搞中国史的不问世界史,搞世界史的很少搞中国史”,以致所谓“世界史”讲的是中国史以外的世界史。所以他大声疾呼“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③这种人为割裂的现象造成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不大了解中

① Charles Taylor,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Amy Gutmann, ed.,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25-73.

②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批准号08JZD0037,合同号08JZH037)的成果之一。

③ 何兹全:《我们需要包括中国史的世界史》,《光明日报》1984年3月14日,收入《何兹全文集》第2卷《中国史综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61—963页。